

文化诗学导论

童庆炳 著

黄山书社

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丛书

学术顾问 钱中文 主编 吴子林

文化诗学导论

童庆炳 著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诗学导论/童庆炳著.—合肥:黄山书社,2017.8
(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丛书/吴子林主编)
ISBN 978-7-5461-6678-0

Ⅰ.①文… Ⅱ.①童… Ⅲ.①诗学-研究-中国
Ⅳ.①I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93691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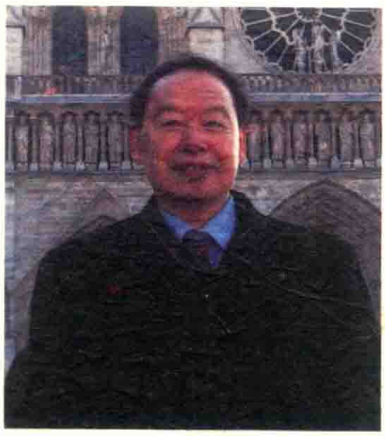
文化诗学导论
WENHUA SHIXUE DAOLUN

童庆炳 著

策　　划　汤吟菲　朱莉莉
责任编辑　常舒雅
责任印制　李　磊
装帧设计　观止堂_未氓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http://www.hspress.cn)
地址邮编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230071
印　　刷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2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字　　数　425 千
印　　张　20.25
书　　号　ISBN 978-7-5461-6678-0
定　　价　69.80 元

服务热线　0551-63533706
销售热线　0551-63533761
官方直营书店(https://hsss.tmall.com)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科联系。
联系电话　0551-63533725



童庆炳（1936—2015）

福建省连城县人，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国著名文艺理论家、美学家、教育家、作家，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文学组首席专家，国家级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师大文艺学研究中心首任主任，著有《文学活动的美学阐释》《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童庆炳文集》（10卷）等30余部作品，主编《文学理论教程》《文学理论要略》等。

| 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丛书 |
学术顾问　钱中文 | 主编　吴子林

总 序

通读眼前的八部书稿，各种情绪：兴奋、激动、享受、叹息、伤感、寂寥……轮番袭来，纠结于心。这时，我想起了一部电影——

音乐家科伦布的爱妻亡故，他从此带着两个女儿隐居深林，整日独自研习古大提琴。在绵延无休的乐声中，他看见深爱的亡妻，此刻就坐在他对面聆听。之后，他们一起祷告，一起乘坐马车，一起并肩走过春色茂密的森林，一起来到河岸渡口，直到她独自坐上小船离去。怕她再次消失，他不忍停下手中的乐曲。为了让她一遍一遍重现，他用余生不断拉奏心爱的大提琴，记下心里的悲伤乐曲，想看看爱将延续到哪里。

这是一个清静的世界。老房子旧得幽静、坦然，乐声绵延无休、难以捉摸，家中的器皿也都散发出乐器的光泽。科伦布在森林里拉琴、作曲，他拒绝宫廷表演的邀请，拒绝各种矫饰，只为灵感而作曲，只是记下瞬间的颤抖，删除多余的抒情。他的演奏闻名遐迩，在传说中更是出神入化。

有一天，17 岁的红衣少年，一个鞋匠的儿子，敲响了音乐家的门。他立志成为伟大的音乐家，慕名前来

学艺，几经周折，红衣少年成了科伦布的学生。后来，红衣少年背着老师受聘为皇家乐队的演奏家，而被逐出师门。再后来，红衣少年成了宫廷乐长，生活富足；音乐给他带来了华丽的马车、镶嵌珠宝的假发衣饰、显贵的地位与指挥权杖，但他不再有17岁时那湛蓝的眼神。他深感自己始终未得音乐的要领。他记得，年少的那个午后，在森林里听到的琴曲，那种庄重、静穆、悠远而哀伤的，才是真正的音乐。

老人弥留之际，宫廷乐长深夜赶赴森林小屋，去上最后一堂音乐课。当他一身显阔地走进那简朴肃穆的家中，发现自己不过是个臃肿的丑角。他问老人："音乐是什么？为了供奉上帝？为了取悦国王？为了金钱？为了荣誉？是爱情的忧伤？或是自暴自弃的放纵？"

都不是。

他终于领悟，自己的疑问便是答案："是不是给死者的礼物？是给那些不能说话的人低声的安慰，给那些消逝了的童年？是为了让鞋匠的锤声变得柔和？是为了那我们出生之前就已存在过的时间，在我们呼吸之前，或者看见光亮之前……"

——这是电影《尘世里的每一个清晨》所讲述的三百多年前的故事，它把我们带回到音乐的黄金时代，唤醒了许多温馨美好的记忆。

是的，倘若音乐有魂魄的话，那就是它的毫无用处，它的无用之用。音乐是爱，是恩慈，是虔诚，是内心孤独的吟唱，是出神的一瞬，是人类关

于光明、自由和宁静的力量的梦想。

“一个民族的政治生活只是它存在的浅层部分;为了了解其内在的生命——其行动的源泉,我们必须通过他的文学、哲学,以及艺术这些反映该民族理念、情感和梦想的东西,来深入探索它的灵魂。”罗曼·罗兰写道,“音乐展示给我们的是在表面的死亡之下生命的延续,是在世界的废墟之中一种永恒精神的绽放。”①

文学艺术的研究与创作一样,都是一种生气灌注、深邃博大的“创世”,也就是发现、创造可能世界,帮助人们建立生命的、家族的、民族的“根”的意识,确立经验的、文化的统一感与连续性,在滋养自身的同时,影响人类的精神世界。

安贝托·艾柯在《诺伯托·博比奥:重新审视博学之士的命运》一文中强调,知识分子的责任不在“解决”危机,而在“制造”危机,即时刻营造出一种危机感,唤起人类的共同意识的危机感,并寻找、创造普遍的社会共识。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即进入“新时期”以来,整个国家处在一种社会转型之中。如何建立中国自己的崭新形态的文艺理论,成了文艺学界的重要课题。面对当代西方文化传入所引发的诸多挑战,以及当代文学创作所提出的诸多命题,经一大批文艺理论家、批评家的共同努力,中国当代的文艺理论终于实现了现代性的转型,即“从一家‘专政’式的独语,转变为‘百家争鸣’式的对话;从政治话语转变为学科的学术话语;从非常态的中心话语,转变为自主发展的常态话语”②。文艺学研究的视野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展,如文艺社会学、文艺心理学、文艺美学、文艺解释学、中西比较诗学、文艺生态学、文艺符号学、文艺人类学、文化诗学等领域,都有人在尝试,并获得了不少结实的成果。

---

① [法]罗曼·罗兰著:《音乐散文集》,冷杉、代红译,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第7页。

② 童庆炳撰:《新时期文学理论现代性转型概说》,《童庆炳文集》第3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68页。

值得强调的是，其中的一些杰出的代表，如钱中文、童庆炳、孙绍振等文艺理论家，他们大多经历过各种政治运动，从没脱离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现实。置身于风云际会的时代，他们怀抱笃定的理想主义的激情，广泛关注历史与现实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各领域，对现有的种种结构模式始终保持质疑的态度，并通过精深的研究推翻僵化不合理的部分，表现出了对时代命脉的精确诊断和敏锐切入。由于洞察了语言符号背后的价值世界，他们成功揭示了其中丰沛而深厚的精神质地，呈现了关于生活世界的总体想象，开启了一个个一般人所未曾领悟的心灵世界。他们的学术成果是对社会文化问题的思考，是显示人文知识分子存在身份的根据，体现了对社会应履行的责任。

至于当下学界的中坚力量，如高建平、王岳川、李春青、陈晓明等一批学者，则是这些前贤的薪火相传者。与师长辈学者一样，对于他们而言，个人与历史、个人与国家互为镜像；他们有着丰富的内心生活及准则，善于提取、想象、弘扬历史与现实中稀薄而弥足珍贵的东西，并以其充沛的语言敞开、释放灵魂的悸动、精神的能量，以内在心灵的秩序对抗外部庸众的世界。

在我看来，文艺理论、美学的研究者以及批评家与作家、艺术家一样，都是这个世界的观察者、倾听者、质疑者和审判员，都是在为一个“缺席的民族”而写作，而不是做历史的书写者、抄写者和打字员。

名利诱惑与学术追求，对于所有问学者来说，是人生中不断出现的十字路口。文学艺术和生命宛若一条河流，收集了星光、烈日、蓝天、雾霾、彩虹和暴雨。面对欲望与生命力蠢动的世界，真正的学者以学术为宗教、为信仰为志业，他们洞察哪些是浮云，哪些是本质；他们所能看到的不只是现在，还有未来；他们播撒怀疑的种子，而不是收成已然明确的事实；他们不只是理念的唤醒者，同时还是社会革新进程的引导者；他们知道，生命只能燃烧，不可虚耗——因为他们手头所持有之物，不外乎时间、记忆和文学艺术所创造的美；而理论的勃勃生机，只能源于抵御纷扰人生的各

种诱惑或压力，源于创造性的质疑、心无旁骛的虔诚劳作和漫长执着的自我探寻。只有在思考和写作中，每个人才能找到自己真正的皈依之所——这是上述优秀学者给我们的深刻启示。

由钱中文先生担任学术顾问，本人主编了“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丛书”。本着“学术乃天下公器”的宗旨，我们拟分期分批分人结集出版，以检阅当代中国学人的学术实绩。本丛书具有开放结构，第一辑推出的为我国当代著名的文艺理论家、美学家、批评家，其中既有年逾八旬的资深学者，也有中、青年学术新锐；每人一集，收录“有分量”的代表作，凸显“一家之言”的戛戛独造。

主编这套丛书的愿望有二：

其一，展现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理论研究与批评所取得的实绩，凸显那些富于中国特色的、有个性、有识见、敢论断、敢担当的学术创见。如，钱中文的“新理性精神”文论，童庆炳的“文化诗学”，孙绍振的“文学文本解读学”，高建平、王岳川之于中西美学的剖析，李春青之于中国古典诗学的建构性清理，以及陈晓明、吴子林之于中国“文学问题”的探究等等。

有识之士指出，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的文化质量，跟它是否拥有富于价值的文学记忆或文化记忆，有着很大的关系。所谓文学记忆或文化记忆，就是有一个或一批伟大的作家、思想家，他或他们代表这个城市、国家，这个城市、国家也进入了这一个或一批伟大作家、思想家的创作生命。简言之，文学记忆或文化记忆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文化形象的塑造，其义大焉。

毫无疑问，包括文艺理论、文学批评在内的学术本身，是中国当代文学记忆或文化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上升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正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系统地向世界展现中国的现代化成就、中国文化和价值观，塑形中国的“大国形象”，至关重要。为此，在推出本丛书的同时，我们还将努力组织专家将它们译成外文，使它们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逐步实现中国文论走出去的宏愿，让西方人了解中国、认识

中国——这是颇有文化远见的举措，在一切追求市场效应的今天显得尤为难能可贵。

其二，志在薪梓承传，泽被后学，希冀后来者能赓续前人纯正的学术品格，全副身心投入到文学这一健康的终生事业中去，以扭转目前文艺理论、美学研究以及文学批评的窘境或困境，切实推进现实社会的改善与进步，使人们重获生命的完满，走出一条焕发生命韵致与光泽的道路。

马克思有句格言："最先朝气蓬勃地投入新生活的人，他们的命运是令人羡慕的。"[①]通读完八部书稿，只觉时光如电，一股氤氲之气回荡其间。偶尔抬眼远望，只见雾霾重重，晨昏不明，仿佛自己悬浮于另一个世界；一阵北风骤起，雾霾一点一点散去，古老的都城一点一点透明起来，一点一点安详、生动起来。

户外，市声隐隐沸动，如深山松涛；窗外，落叶敲打着落叶，雨点追逐着雨点；远方，迷迷蒙蒙，嚣嘈不舍昼夜——我听到了生活行进的坚实步履……

一切都只是开端。"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丛书"还将推出第二辑、第三辑……并将进一步扩大规模。我们真诚地希望读者诸君提出宝贵的批评建议。

是为序。

吴子林

2016 年 12 月 23 日

① ［德］马克思撰：《致 R》（1843 年 5 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408 页。

我的新时期文学理论研究之旅(代自序)

1936年12月,我出生于福建省连城县莒溪村。1952年毕业于连城一中初中部。1955年毕业于福建龙岩师范学校。1958年提前一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留校任教。现为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文学院教授委员会主席,文艺学博士生导师,国家级重点学科北师大文艺学学科点学术带头人,教育部文科基地北师大文艺学研究中心学术顾问。

自1958年大学毕业留校任教,我便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师从黄药眠教授。经黄药眠先生精心指导,逐渐形成自己的文学理论研究路数。1963年为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发表的长篇论文《论高鹗续〈红楼梦〉的功过》,是我发表的第一篇正式论文。这篇受到好评并被收入《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等多种集子的论文,激发了我做学术研究的自信心,但同时我也因此被列入"走白专道路"的名单中,而遭受到政治整肃。1963—1965年在越南河内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期间,我讲授过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及作品选读、古代汉语、写作等课程。我在每周讲授24节课的情况下,利用一切时间,编写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简史》,在

炮火连天的河内油印出版，还注释了几十万字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1967—1970年在阿尔巴尼亚地拉那任教期间，除讲授“中国文学”课程外，我用大量的闲暇时间研读“十三经”“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和中外名家的大量作品。仅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我就阅读了二十多部。这为我日后的研究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我是幸运的：当我的同事下乡之时，我在炎热的河内静静地读书备课；当我的同事不得不为“文化大革命”浪费时间之际，我则在地拉那宁静的城市里研读中外各类书籍。1958年至1976年可以说是我学术研究的一个准备时期。

> 出于对长期以来的文论的政治化和哲学化的不满，我开始了“审美诗学”的建构。“审美”文学的特征，这是我新时期最初的理论观点，许多文学理论问题都要在“审美”的视野下加以具体的解释。

1978年进入新时期以后，整个国家处在一种社会转型中，如何建立中国自己的新的形态的文艺学的课题被现实生活鲜明地提出来了。我的文艺学的教学和研究也随之开始新的阶段。我和文艺学界的同行们此时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清理影响中国文艺学长达几十年的苏联教条主义文艺理论的僵化模式。从新中国成立初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文艺学始终受到苏联20世纪50年代极“左”的文艺学的深刻影响。苏联50年代的文论基本上是20年代“拉普”派的庸俗

社会学和机械论文论的翻版，把一切文学问题政治化和哲学化是其突出的特点，并非创作实践的总结。更为严重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连文艺学的一般常识也被完全堵塞。由此可知，新时期开始，文艺学学术研究的起步是十分艰难的。

在这种历史语境中，我清醒地认识到在文学问题上大而化之的哲学化，是阻碍中国文艺学发展的最重要的问题，而如何突破此前的“反映论”的单一的视角，寻找到文学自身的特征是当务之急。这一时期我的研究主要就围绕这个问题展开。我加入了有关文学创作的“形象思维”的讨论，发表了《略论形象思维的基本特征》《再论形象思维的基本特征》和《评当前文学批评中的“席勒化”倾向》三篇论文，力图摆脱文学研究中的政治化、哲学化模式，揭示文学自身的特征。但是在此期间我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向俄国大批评家别林斯基发起“挑战”，发表了受到当时文论界广泛重视的《关于文学特征问题的思考》一文（发表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 年第 6 期，1982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编的《文学年鉴》作了详细介绍，并选入《中国新文艺大系·理论一集》）。这篇论文质疑“文学形象特征论”的正确性。这种理论认为：文学与科学的不同不在内容，而在形式。科学家用逻辑说话，文学家则用形象和图画说话，可它们说的是同一件事，所以文学的根本特征就是用形象来反映生活。我的文章认为区别事物之间的不同特征首先要追寻它们的不同内容，然后才是形式。文章写道：“形式，这是事物的外部联系、外部标志，它不可能从根本上确定事物的特征；内容，这是事物的内部联系、内部规律性，只有它才能从根本上确定事物的特征。”“我丝毫没有否定‘文学用形象的形式反映生活’这一命题的意思。问题在于‘文学用形象的形式反映生活’这一特点难道不是由文学的独特对象、内容派生出来的吗？”由此，我认为上述文学特征的定义是有问题的。我由这篇文章追根溯源，进而发现这一说法最早是由俄国大批评家别林斯基提出来的。别林斯基曾强调指出：“人们只看到，艺术和科学不是同一件东西，却不知道它们之间的差别根本不在内容，而在

处理一定内容时所用的方法。哲学家用三段论法，诗人则用图画和形象说话，然而他们所说的是同一件事。”我认为别林斯基的观点是受黑格尔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影响所致。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里，“理念”是万事万物的根本，是它派生出一切事物，因此只能从不同的形式来区分此一事物与彼一事物的不同特征。别林斯基的文学特征论显然是黑格尔“理念”论在文学问题上的翻版。把这样一个黑格尔式的文学特征论长期奉为圭臬，不但是错误的，而且会使中国的文学理论裹足不前。在理清了别林斯基的文学特征论后，我在文章中提出了关于文学特征的理论假设——文学特征问题应分层次、分主次地进行探讨：甲，文学的独特内容——整体的、审美的、个性化的生活；乙，作家的独特的思维方式——以形象思维为主，以逻辑思维为辅；丙，文学的独特的反映形式——艺术形象和艺术形象体系；丁，文学的独特功能——艺术感染力，以情动人。我认为文学和科学的具体的对象与内容是不同的。文学反映的生活是人的整体的生活，即现象与本质、个别与一般具体地、有机地融合为整个生活。整体不是指包罗万象，而是“从一粒沙里看一个世界”。“一首短诗可能只抒发诗人瞬间的一点感受，一篇小说可能只写两三个人之间的一点纠葛，但都是活生生的一个完整的世界，那里面闪烁着生活的全部色彩。”进一步说，这种整体的生活能不能进入文学作品中，还要看这种生活是否与审美发生联系。“文学是美的领域。文学的对象和内容必须具有审美价值，或是描写之后具有审美意义。”更进一步，还要看这种生活是否经过作家的思想感情的灌注，留下作家精神个性的印记。可以说我的这篇文章是新时期国内最早揭示“文学形象特征论”的缺陷，并提出“文学审美特征论”的文章之一。此后我又吸收马克思主义关于对事物的“艺术掌握”以及“诗意的裁判”的观念，认真学习了马克思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涉及美学的论述。此外，苏联 80 年代文论界的审美学派的理论资源，也进一步丰富、完善了我的理论。我将上述理论最早吸收进高校的《文学概论》教材中，特别是我自著的由红旗出版社出版的教材《文学概

论》(上、下),以“文学审美特征论”贯穿全书,使教材面貌焕然一新。由于全国各地高校纷纷采用此教材,发行量达到了27万册,从而使我的“文学审美特征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文学审美特征论”改变了文学理论简单套用政治理论的模式,推动了中国现代文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另外,我还把“文学审美特征论”运用于文学理论的重要问题——文学典型——的研究中,于1994年发表了论文《特征原则与作家的发现》,提出了与以前的哲学化的典型定义——典型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或典型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完全不同的典型定义。文章认为,过去的典型理论缺少“中介”,因此只是把典型的塑造过程看成是对生活的“综合”或“拼凑”。文章借用德国古典艺术鉴赏家希尔特的“特征”理论,把典型创造理解为对特征的生发、强化,把典型理解为经过特征化的、能够唤起人们美感的形象。我的文章认为:“就外延而言,‘特征’可以是一句话、一个细节、一个场景、一个事件、一个人物、一种人物关系等;就内涵而言,‘特征’具有两种属性:其一,它的外在形象是极其具体的、生动的、独特的;其二,它通过外在形象所表现的内在本质又是极其深刻丰富的。‘特征’是生活的一个凝聚点,现象和本质在这里相连,个别和一般在这里重合,形与神在这里聚首,情与理在这里交融。特征化就是指作家对他所抓取的生活凝聚点的加强、扩大和生发的过程。”所以典型创造是否成功,不在积累的生活材料的量的多少,而在于质的高低。我的关于典型问题的“特征”说,是国内典型理论的一种新的论说。这一理论由于它深入到文学的审美层次,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也被学术界不断地引用。我还发表文章试图用“审美”的观点来解释艺术真实性问题、文学结构问题,以及文学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等问题。

我的文学审美特征论研究,获得了文学理论界的理解与支持。随后,我的“审美”论就进入各类教材。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文学年鉴》转载了我的论文;许觉民先生主编的《新文学大系》“理论卷”收入了我的

论文;多年后,王蒙和王元化主编的另一本《新文学大系》"理论卷"也收入了我的论文。值得一提的是,越南重要的期刊《文学》,专门翻译了我评论苏联文论的文章。我自编的以审美为核心观念的教材《文学概论》,1984 年第一版印刷了 27 万册,它在大江南北、黄河两岸学习文学理论课程的师生手中流传。1982 年我还是讲师,1986 年我成为了教授,我还是 1985 年北京市的"劳动模范"。我自己把新时期这一时段的文学审美特征论研究,称为"审美诗学"研究时期。

80 年代中期文学理论界提出的文学主体性是一个重要问题,为深化文学主体性研究,"心理诗学"的探索耗费了我多年的时间。"体验"成为我们阐释的核心观念,而把"矛盾上升为原理"则是我的一种研究思路。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文艺学"拨乱反正"的任务基本完成后,"实现文学观念的转变,以适应变化了的文学现实"的问题被鲜明地提了出来。1985 年刘再复发表了《论文学主体性》的重要论文,在学界掀起轩然大波,立刻引起了激烈的论争。一些人完全否定这篇论文,但我是赞成刘再复的观点的,我认为应该延伸他的研究。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研究,我觉得仍然囿于哲学的范畴,难于在文艺学范围内进行深入的探讨。我意识到"文学主体性"问题的重要意义,同时感到"文学主体性"问题可以转到"文艺心理学"领域加以研究。1986 年我申请到了国家"七五"社科重点项目"文艺心理学(心理学美学)研究"。从 1985 年起到 1992 年,经过七年的时光,我和我指导的研究生终于获得了令人欣慰的成果,出版了"心理美学丛书"(十五种),论文集《艺术与人类心理》,以及由我任主编的、达 56 万字之多的学术专著《现代心理美学》。我自己的学术专著《艺术创作与审美心理》一书也列在"丛书"中。我和我的学生的"心理学美学"研究与一般的"文艺心理学"有些不同,我们不把"心理学美学"看成